

# 文化标出性中的符号意义变迁与回应\*

田野,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在文化标出现象中,拥有资本的多少决定了正项、中项与异项的位置,但是资本又要在具体的场展开;对于中项偏边而言,中项通过被“询唤”成为主体而难以真正认识自身,进而保证中项对于正项的支持;异项面对自身的标出有多种回应方式,并且标出并不是被动的,异项也通过自我标出的方式言说自身。以上讨论进一步说明了标出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其研究空间的广阔性。

[关键词] 意识形态;资本;解码;文化标出性

[中图分类号] G02;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8)02-0155-05

对于标出性的讨论,最早见于语言学领域,即俄国语言学者特鲁别茨柯伊就清浊辅音在语言使用中的不对称问题与雅柯布森的讨论,随后,这一问题涉及语言的形态等方面的讨论,正如功能语言学家吉冯所总结的:“在结构复杂性上,标出性结构较长;在分布频率上,标出性出现次数较少;在认知复杂程度上,标出性更为明显。”<sup>[1]</sup>随后赵毅衡的《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从符号学角度将标出性问题的讨论延伸到文化领域,并总结出三个必须:“必须划出少数异类,必须边缘化异类,必须容忍异类。”<sup>[2]</sup>然而在标出性问题的研究中,至今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是被人所忽视的:正项、中项与异项的划分依据?中项偏边问题背后的文化秩序再生产问题?异项如何解读自身被标出的现实?而笔者也试图在本文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回答,以期能引起学界对于标出性问题的更多重视。

## 一、正项、中项与异项的划分

如果我们将围绕某一文化秩序所再现的文化现象视为一种结构,那么作为要素,正项、中项与

异项便获得了不同位置,而文化现象也以三项位置关系的变动而变化,顾名思义,所谓正项居于结构中心位置,它们是秩序的制定者,因此整个结构也以为它们服务为目的,于是正项不仅要建立秩序,更重要的是保证结构的再生产。与正项截然相反的则是居于结构边缘位置的异项,它们被视为是反动的、危险的,于是被放逐到结构的边缘,这不仅仅是权力的边缘,更是话语的边缘,因此它们以一种“他者”的形象出现在结构之中,而它们之所以被如此对待,全在于它们对于整个结构秩序的威胁,尤其是对于正项位置的威胁,一方面它们是僭越者,它们破坏既有的结构秩序,另一方面它们作为正项的对立面,正项需要与它们划清界限以确保自身位置的合理性。因此,福柯笔下的疯癫者便以异项的身份出现,精神病院与现实社会的一墙之隔便是标出的具体表征,但社会构成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以连续的样貌存在,于是在正项与异项之间便为所谓的中项提供了存在的空间。然而,正如赵毅衡所述,中项最大的特点便是自身的难以界定,它们必须通过依靠某一方来获得界定,毕竟客观划分异项、正项的依据是不

[收稿日期] 2017-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作者简介] 田野(1993—),男,山西沁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符号学理论;赵毅衡(1945—),男,广西桂林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符号学。

[引用格式] 田野.文化标出性中的符号意义变迁与回应[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2):155-159.

存在的,尽管以某种客观性为这种划分合理性做辩护,然而在剥离了知识或是宗教的神圣色彩外,这种划分必然暴露其任意性,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无法为其找到一个先验的借口。笔者建议以同心圆的模型来安置三项,尽管这也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行为,因为三项的关系远不像圆环那般整齐平滑,而且它们关系的动态性也难以体现,但这种模型毕竟是可以看到三项的地位差异的,于是何种因素导致这种差异?笔者在此并不打算罗列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解释,而是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切入点,试图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解答。

布尔迪厄作为20世纪颇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其对于资本的讨论突破了传统的经济范畴,将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讨论,他将资本视为“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sup>[3]189</sup>。他将资本分为三种(后补充象征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凭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态。”<sup>[4]</sup>在此,对于资本的进一步讨论就涉及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场”的概念,场是资本展示的平台,“资本的不同种类的等级也随着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sup>[3]143</sup>,在此,布尔迪厄以游戏与筹码对场与资本的概念做了类比:“我们的确可以小心地把一个场比作一场游戏,虽然场不像游戏,不是创造性地故意为之的产物,但它却遵循规则,或者比之更好的规律性。”<sup>[3]143</sup>而人们在场中的位置便由他们手中相应的资本所决定,因此布尔迪厄也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式来定义场:“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sup>[3]142</sup>在布尔迪厄看来,界定场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时间与空间被割裂的现代,以时空的方式界定场更为困难,因此他试图以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探寻场的界线:“场的界线位于场的效应终止的地方。”<sup>[3]146</sup>到这里,布尔迪厄场与资本的概念就为文化标出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具体的文化现象可以被视为游戏的结果,而现象背后的文化秩序便是游戏规则,即场域中的资本逻辑,在不同的场中,对于资本有不同的要求,一个场中的正项在另一个场中并不一定仍然是正项,因为场的改变意味着资本筹码的改变,这一点我们在孔飞力的《叫魂》中可以得到展现,即在政治上,满清

贵族对于汉人的排斥以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这在钱穆看来也正是清朝政治自私的地方,但在文化上,这些政治贵族却有着文化不自信的心态,他们通过不断地吸收与改造汉文化来充实自己,最为典型的体现便是承德避暑山庄与圆明园。由此我们看到主体因身份的矛盾而存在着的分裂性,彭佳在《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中也提到了这种身份不一致的情况,她将“正项/中项/异项”的动力性关系划分为显性层面与隐性层面,并认为“尽管对正异项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元语言层面的中项偏向哪边,中项的显性层面之间各部分却不一定保持偏边的一致”<sup>[5]</sup>。事实上,在被后现代思想不断冲击的情况下,一元性的元语言已经逐渐被多元主义所替代,因此身份的矛盾性在当今更为普遍。资本筹码的多少决定了参与者在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对于文化标出问题而言,整个文化秩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许多场所共同构成,但我们在此讨论的文化问题又绝不能仅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来解决,因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是以权力为考量的,而我们所讨论的文化则与意义同轨,正如人类学家吉尔兹所说的人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文化资本的多少(尽管文化资本难以量化)与结构位置有必然关系,因为除此之外,一方面仍要考虑具体的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其他资本的影响。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超级场的出现影响着其他场的独立性。在我们国家,这个超级场正由政治转向经济,改革开放前政治对于经济、文化等场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改革开放后经济正逐渐影响其他场,这就意味着经济资本正逐渐成为一种万能资本,在经济场中占优势地位的群体,在其他场中仍然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资本而占有较高地位,这一点从节日产生便可看出,当今消费不仅影响着其他节日,甚至创造了自己的节日,不论是中国的双十一,还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传统节日或是政治主导,或是带有宗教性质,在今天都一律被商业所影响。由此,在文化结构中,经济资本的权重越来越大,正项与经济资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 二、中项偏边问题背后的文化秩序再生产

在标出性问题中,何以正项能够将异项标出在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这不得不涉及对中项问

题的讨论,即正项支配地位确立的前提是中项的支持,进一步说,正项的合法地位是深扎于中项之中的,因为中项自身无法界定,所以标出的意义正是在于使得正项通过区别异项的方式来得到界定,作为文化标出关系最紧要问题的中项,正项是以何种方式为其代言?在此笔者将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借用他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揭示来理解中项偏边问题的实质。

在阿尔都塞看来,他一方面认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但是同时他也认为上层建筑有其独立的空间。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沿着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探讨了生产关系再生产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上层建筑的作用空间即是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保证生产力的再生产。在这样的逻辑推理下,阿尔都塞区分了两种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国家概念,而后者是阿尔都塞对国家定义的补充,也是其揭示国家统治奥秘的关键,即“强制性国家机器通过暴力起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sup>[6]147</sup>。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构成是极为复杂的,它包括宗教、教育、家庭等,然而,“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论它们是什么,促成了相同的结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sup>[6]154</sup>。在本文后半部分,阿尔都塞从讨论意识形态出发,探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起作用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他将意识形态界定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sup>[6]161</sup>。他从认识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想象性关系,“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向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存在条件,他们的真实世界,最重要的,是在那里得到表征的他们与那些存在条件的关系”<sup>[6]163</sup>。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又从另一个方面对意识形态进行界定,即“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sup>[6]164</sup>。这一观点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色彩,即基于个体存在的物质性条件决定了这种想象性关系的物质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与其同时代的布尔迪厄的核心概念——“习性”,它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实践,对于后者,实践沟通了习性与区隔,而对于前者,“观念(意识形态)的存在被写进了最终由一种意识形态机器界定的惯例所统治的实践中”<sup>[6]168</sup>。这便顺水推舟地引出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即“询唤”,而这也正是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起作用这一

问题的解答,这一概念也体现了结构主义对于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所谓询唤,即是主体赋予的过程,即“总体意识形态将具体的个体当做属民招呼或质询”<sup>[6]171</sup>。个体被一步步引向主体(subject)为他所安排的位置中,这就犹如观众手中的电影票一般,从他们在取得电影票的瞬间开始,他们的位置早已经固定了,他们所能做的便是走向他们的位置,这正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人天生就是意识形态动物。”这种宿命式的腔调多少反映了阿尔都塞思想的悲观主义色彩,也不断受到人们的指责与批评,因为个体失去了反抗的余地,尽管如此,阿尔都塞还是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性,甚至它比强制性国家机器(RSA)的斗争更为激烈。

至此,通过对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不难看出其所回应的是“统治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与中项问题是如出一辙的,无法界定自身的中项借着意识形态的指导找到他们的位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非如强制性国家机器那样在公共空间被识别,它遍布社会方方面面,而且它以中性的、客观的知识形态的展示让人难以察觉,这不得不让人想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传统与现代规训方式的区分,即从肉体到精神的转变。在阿尔都塞看来,学校—家庭取代了宗教—家庭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机器,这些领域都对个体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阿尔都塞忽视了媒体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下手机已成为我们身体的特殊器官,以至于人们对于手机的依赖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媒体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讨论至此,中项果真就只能依靠着意识形态机器的控制来被称为主体,而无法为自身的独立性留有余地么?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项并非不可以实现自我界定,只是不被允许。原因是它们必须通过区别的方式来保证异项的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自身的存在就必须以区别的方式实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背后的主体以一种方式被否定,但以另一种方式复活,它便是尼采所强调的对于理性的否定,是生命本身的意志,是实实在在的自我,一切假面的知识在这赤裸裸的欲望之下都将被粉碎,它不再被告知“你应”,而是喊出“我要”。

### 三、异项如何面对标出

古往今来,文化样貌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几百年前女人裹小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而到近

代被认为是封建糟粕、女性被宰制的体现。正如前文所述,由三项所构成的文化秩序并未能够历万世而不变,这正是三项关系变化的体现,它们的位置并非固定的。这一方面是结构内部的变化使得结构发生改变,如赵毅衡提到中项歉疚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异项对于秩序的不满与反抗。因此它们一方面怀疑与否定现有秩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寻求自身的合法地位,而结构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会加剧这种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所谓的标出性翻转的结果。在此,笔者不对中项与正项做过多的分析,而是就标出项面对既有的文化秩序,如何解读自身被标出的现状做一番讨论。

英国文化研究大师斯图亚特·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就电视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反映提出了三种解释可能,即主导—霸权型、协商型以及对抗型。所谓主导—霸权型解码指观众完全遵循着节目编码者的意图进行解码,认可与接受文本中的信息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内容,对抗式解码则是指观众对于文本信息的拒绝与否定,并认为文本内容是虚假的、带有欺骗性的,协商式解码则居于支配式解码与对抗式解码之间,“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sup>[7]</sup>。在此,笔者借用霍尔解码理论的三种解码模式来分析异项对于自身被标出的解读,并探讨在不同的解读下可能发生的行为。

在支配式解码的情况之下,异项对于自身的被标出是接受与认可的,这也是上一节所说的文化秩序再生产的理想情形,它们承认了自身的边缘性并按照社会期望来修正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免于被标出。在这里我们需注意的是,异项并非是生来的,而是由于主体行为所获得的身份,也就是说异项是一种身份,于是在性别秩序中,异项并非是全体女性,而是那些威胁到性别秩序的群体,而这个群体不仅有女性,而且有男性,那些遵从性别秩序而行动的女性不仅不会被否定,还会被塑造成一种正面典型的形象被推广以此来促进性别秩序的再生产。于是在支配型解码中,异项所认识到的标出不是先天的,而是基于后天的行为而获得的,由此它们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在认可自身行为被标出的同时,也就暗含着它们要主动地修正自身行为,以脱离被标出的事实,从而回到非异项的行列。在经典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的妻子珍妮便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珍妮处

于异项时,她漂泊不定、颠沛流离,并且在感情与生活上也不顺利,等到最后珍妮回到阿甘身边做一个好妻子时,她实现了人生的幸福。

在对抗式解码的情况下,异项对于自身被标出是否定和拒绝的,它们不满将自身标出的理由,由此,它们强调与谋求改变,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还是在同一时期的黑人运动,都谋求自身应有的权利,否认以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此可以看到这种对抗式回应的几种表现:其一是以知识合理性来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如以“天赋人权”等思想遗产以及从生物、社会学等学科证明自身并非低人一等;其二是对于话语权的争夺来去污名化,如另类媒介的创立以向公众展示真实的群体,以此来修正主流媒体的他者形象;其三是发起社会活动来表达自身诉求、引起关注并促成对话,如静坐运动、占领学校运动等。异项通过此种方式对中项产生压力,这正是“批评是异项争取中项的终极手段,它不停激发正项在这一层面与之论战,也使文化获得了某种自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sup>[8]</sup>此外,还需注意的另一种对抗式解码情况,即异项的自我主动标出,异项通过积极主动的自我标出而与正项与中项保持距离,以此来拒绝正项与中项的收编与影响,这一点尤其在艺术中颇为普遍。赵毅衡在讨论异项艺术时认为:“异项艺术似乎是为标出项争夺注意力,实际上反而参与标出,使异常项更加明显地异常:异项艺术并不意图参与中项争夺,并不致力于把异项变成正常。”<sup>[2][11]</sup>而这一点也与现代艺术的诉求相吻合,“现代艺术由于走的一条精英主义的自恋路线,艺术家和大众的纽带被割断了,因此变成了小圈子的”<sup>[9]</sup>。正是现代艺术的自我标出,通过远离世俗与商业化来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以此更好地实现艺术的认识与批判功能,也正是因为这个目的,现代艺术竭力避免自身回到古典艺术的路上,二者之间产生了鲜明的断裂。

在协商式解码情况下,异项既不想做一个僭越者,又不想彻底地否定现有的秩序,这就是它们陷入的一种矛盾境界,由此它们的身份与行为便难以合一,它们既不是秩序中的砖瓦,也并没有站在秩序的对立面,而秩序未能将它们完全收编,当然也更谈不上彻底排斥。总而言之,它们一只脚在秩序内,而另一只脚在秩序外,它们接受了自己的僭越行为,但是对于这一行为所导致的新的身份又犹豫不决,并为自己找寻到另一副面具来掩饰自身的矛盾心理。举例来说,那些被认为是男

性职业领域中的女性,就经常有着这样的心态,一方面她们走到了一般女性难以企及的位置上,但是另一方面,她们被男性包围着,她们依然不是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是参与者,于是她们仍按照已有的游戏规则行事,以此保全自己,这是她们与现有秩序的妥协,或者说,她们为了一种自由而接受不自由。

正如霍尔的解码理论展现了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这区别于以往的受众研究或是如魔弹论强调媒介文本对于解读的主导,或是如游戏论夸大了受众的自主性。同样地,在标出性问题上,霍尔的启示也在于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它为异项的自主性划出了空间,以此来突破壁垒森严的文化秩序,同时也不难看出,三项之间的关系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区隔,相反,它们是流动着的,因为在根本上,标出不是僵死的,而是有着相当灵活的策略。

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布尔迪厄,还是阿尔都塞和霍尔,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而标出性理论本身也带有很深的后结构主义色彩。本文触及主体问题与话

语权问题,展示了标出性理论对于理解文化的强大解释力,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始所说,标出性理论有待于更进一步的丰富。

####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6.
- [2] 赵毅衡.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8(3).
- [3]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4] 朱伟珺.“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6):117-123.
- [5] 彭佳.论文化“标出性”诸问题[J].符号与传媒,2011(1):66-76.
- [6] 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7]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64.
- [8] 彭佳,王万宏.“中项”与文化“标出性”的改变[J].江苏社会科学,2011(5):143-146.
- [9] 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15.

##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Sign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Marking

TIAN Ye, ZHAO Yih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ree issues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marking: the division of positive term, negative term and medium term; the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order behind the medium term; and the response of negative term to cultural marking. The amount of capital possession decides the position of the three terms, but the capital will launch in some specific fields. The medium term becomes the main body by being “called” so cannot truly recognize itself, thus guarantees its support to the negative term. The negative term has several ways of response faced to its own marking, and the marking is not passive, so it shows itself by the way of self marking. These discussions further display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of marking as well as the wideness of its research space.

**Key Words:** ideology; capital; decode; cultural marking

[责任编辑 易奇志]